

傳記文學叢刊

宋哲元與七七抗戰

李雲漢著

宋哲元與七七抗戰

李雲漢著

傳記文學叢刊之十三

傳記文學叢刊之三十一(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宋哲元與七七抗戰

定價新臺幣一百元

著者：李雲漢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
臺北市郵政信箱第 1-36 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一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719 號

新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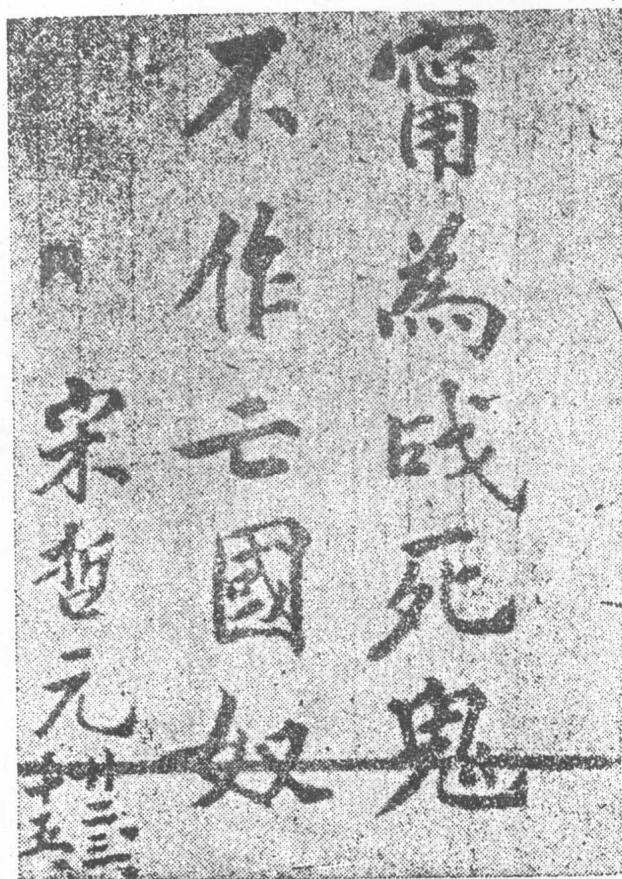
元哲宋之長軍軍九十二任



元曹宋之揮指總任習演大軍九十二



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之宋哲元



宋哲元表示抗日決心之遺墨

宋哲元與七七抗戰 目錄

一、緒言·····	一
二、宋哲元的崛起·····	七
(一) 家世與性格·····	七
(二) 宋哲元與馮玉祥·····	一〇
(三) 二十九軍的編成·····	一八
(四) 主察前後·····	二二
(五) 血戰喜峰口·····	二七
(六) 調停察變·····	三一
(七) 軍隊訓練·····	四七
三、宋哲元與華北危局·····	五三
(一) 塘沽協定後的華北形勢·····	五三
(二) 察東事件與大灘會議·····	六〇
(三) 所謂「何梅協定」·····	六八

(四) 張北事件與秦土協定……………八三

(五) 日人策動「華北自治」……………九二

(六) 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一一七

(七) 宋哲元與日人間的周旋……………一三一

○冀東與察北問題……………一三一

○共同防共問題……………一三八

○日本增兵華北威脅宋哲元宣佈自主……………一四五

○豐台事件與十月危機……………一四九

⑤華北經濟開發問題……………一五五

(八) 宋哲元與國內政治危機……………一六八

四、七七事變的爆發與宋哲元的應付……………一七九

(一) 七七事變導因之一——冀察趨向中央化……………一七九

(二) 事變的爆發與宋哲元的猶豫……………一八七

(三) 南京與東京間的交涉……………一九七

(四) 宋哲元最後的決斷——守土抗日……………二〇三

(五) 宋的自責與政府的信任……………二一〇

引用及參考書目……………二一五

索引……………二二五

一、緒言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的爆發，揭開了中國對日八年抗戰的序幕。這是我中華民族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犧牲最重的一次自衛戰爭，是一場維護民族生存，國家獨立，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的聖戰。我們動員了全民族的力量，經歷了整整八年的艱苦歲月，蒙受了史無前例的生命與財產的慘重損失，終於在民族領袖蔣中正先生的領導下，光榮的打贏了這場聖戰。凡是中國人，無論是在國內或是在海外，除了極少數喪心病狂，甘心受辱的漢奸敗類外，相信沒有人不為這場偉大民族戰爭所獲致的光榮勝利而感到自慰與自豪。

對日抗戰的歷史意義是重大的，它所發生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如何把這場偉大民族戰爭的史實，客觀的記錄下來，把愛國志士們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事蹟，生動的描寫出來，把當時軍政負責當局忍辱負重的深謀遠慮，公正的披露出來，把我們強大的民族潛力與戰時政治社會的加速進步，真切的刻劃出來；使之書為民族的史篇，發為民族的心聲，凝為民族的情感，鑄為民族的生命；實為當代歷史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責無旁貸的義務。

近年來，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在歐美各國已蔚成風氣。論述中日戰爭的英、日文著作推陳出新，源源出版，然而够學術水準的中文著作，則仍是寥寥可數。值得憂慮的是：近年來由於國際政治逆流的激盪，若干日本及美國的青年歷史學者們在其有關中日戰爭的論著中，已經顯示出作「翻案文章」的趨向。日人秦郁彥及美人柯勞利（James B. Crowley）於其著作中分析戰爭責任時所持的觀點，可為這種趨向的代表。〔註一〕更有有甚於此者，中共偽政權近復大肆其篡改史籍，曲解史實，偽造史事的伎倆，抹殺我全民族團結一致奮鬥犧牲的鐵的事實，妄稱抗戰勝利

是其一萬一人之功。竊國大慾，盜名炫世，無耻之尤，莫此爲甚。面對民族抗日聖戰史實被曲解、篡改甚至毀棄的危機，從事現代史研究的學者們，豈能熟視無睹？

基於對於民族歷史無可推卸的一種責任感，著者於四年前開始對七七事變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進行研究。蓋自日本於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強佔中國東北後，有識之士已預知中日兩國間的一次攤牌性的全面戰爭，已屬不可避免。然而戰爭並未立即爆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六年，才又爆發了七七事變。這是由於中國政府鑒於國力之不足與抗日時機的尚未成熟，在「攘外必先安內」的原則下，有計劃的對日本所採取的緩兵之計。爲延緩日本的侵略行動，同時又要保全國家的領土主權，中國政府不能不遷就現實，迎合日人的願望，在華北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的特殊行政組織，任命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爲委員長，負責與日人周旋。冀察兩省當時是國防的最前線，是日本軍閥所欲侵佔的直接目標。中國政府授予宋哲元冀察政治外交的全權，以應付日本軍方的挑釁，日本軍事當局却又威迫利誘，千方百計的想利用宋氏爲其傀儡。所以宋哲元在當時的各省疆吏中，權力最高，責任最重，地位最特殊，處境最困難。宋哲元主政冀察兩年又半，誠然有許多難爲國人諒解的地方，但他在政府領袖的充分信任下，任勞任怨的支撐着華北危局，不但未曾出賣國家的領土與主權，最後仍是首先奮起抗日的先鋒，在民族大節與愛國情操方面，宋哲元與其二十九軍的全體將士們，是經得起考驗的——本書的主旨即在依據多方面的可靠資料，評述宋哲元在七七事變前支撐華北危局的經過，七七事變發生的背景，事變發生後宋哲元的應付及其功過。是宋哲元的評傳，是七七事變的專題研究，也是中華民國政治史與中日近世關係史範圍內極其重要的一篇。

在結構上，本書分爲三部分：

其一，是宋哲元的崛起：重點在敘述宋哲元早年的軍旅生涯，由一個默默無聞的學兵積功遞升爲上將軍事將領的過程，並藉其在治軍、作戰、事上、馭下各方面所表現的特徵，論斷其所以爲政府領袖們信任而畀以大責重任之因素。宋哲元是位質樸的軍人，是馮玉祥西北軍系統內的一員「虎將」。在他主持冀察軍政以前的地位及給予國人

的印象，胡適有句話說：「宋哲元先生在一般民衆的心理，是馮玉祥先生的忠實信徒，是國民軍的最高代表，是喜峰口作戰的好漢。」〔註二〕這句話後半的論斷自是事實，惟前半說宋是馮的「忠實信徒」，却有加以詮釋的必要。誠然，宋哲元是在馮玉祥的戎幕中，從最低級的位置升到最顯要的地位，馮視宋爲股肱，宋對馮亦唯命是聽，但這都是民國十九年多以前的事。十九年多閻、馮叛變失敗以後，宋哲元在思想上發生了轉變。他覺悟到擁護國家統一才是一個軍人的本分，爲了地盤與權力之爭而無端掀起戰亂，並不是愛國的舉動。所以宋哲元於接受中央改編擔任二十九軍軍長以後，即誓言不再參加任何內戰。當民國二十二年夏，馮玉祥在察哈爾標榜抗日，別樹一幟，希圖利用時勢，東山再起時，曾派人游說宋哲元，希望宋能「不忘故主」，宋的態度却是「我絕不打先生（指馮），但是也不跟他去胡鬧。」〔註三〕這時的宋哲元已不是馮玉祥的「忠實信徒」，而是馮的諍友。馮玉祥對部下的嚴苛是衆所週知的，宋哲元以陸建章的舊屬轉爲馮玉祥的部下，由低級幹部積升至股肱地位，自然也不是件容易事。這是由於宋在治軍、作戰方面所表現的忠懇、樸實、勇毅、用命等優美品性，而獲得馮的賞識。宋這些優美品性，加上他愛國的熱誠，擁護國家統一的志節，以及喜峰口血戰殺敵的輝煌戰績，構成了獲得政府最高當局的充份信任，而昇以主持冀察軍政重責的基本因素。因爲一個具有這些優良品性與抗日歷史的人，大衆相信他是不會背叛國家民族的！

其二，宋哲元在七七事變前支撐華北危局的經過：重點在於分析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華北的陰謀與行動，宋哲元以特殊的地位在極微妙的情勢下與日人周旋的經過，以及在國內政治危機中宋哲元所持的立場及其所發生的影響。宋哲元主持華北危局的一段時期內，在對日關係與國內政局的變化方面，他都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對日關係方面，中國政府賦予宋守土保民的責任，要求他奉行中央的決策，日本軍閥却同時選中他作爲建立傀儡政權的首領，千方百計的壓迫他宣佈自治，脫離中央。實在說來，當時冀察的前途實繫於宋哲元的轉念之間。宋能堅持國家立場，冀察當然仍是中國領土。倘宋昧於大義向日本軍方低頭，或是對中央攜貳希圖自立局面，則華北恐將爲東北之

續。事實已證明宋哲元忠於國家，擁護中央。但當他不時表現曖昧的態度，發表閃爍的言辭，與日人不斷接觸並顯示其特殊地位時，却曾受到國人的懷疑、非難與責罵。另一方面，當他敷衍拖拉，若即若離，終不肯向日人屈服時，日本軍閥却又不斷的想以武力驅逐他，代之以王克敏、齊燮元甚至韓復榘之流。〔註四〕宋實處於夾縫中間，居難兩全，退亦無路。但他對國人的責難從未作公開的答辯，他願讓事實證明一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樫茂曾向東京報告：「今日日本陸軍以爲宋已爲日本收買，實則宋亦支那人也，決不願日本奪取支那領土，觀其態度之曖昧可知也。」〔註五〕這足可說明宋當時的立場。對國內政情方面，由於宋哲元並非出自中央的嫡系，又兼處於特殊重要的地位，所以凡是企圖反抗中央政府與蔣中正委員長的集團與個人，無不想法拉攏宋氏。西南方面的代表任援道常川駐平是公開的事實，張學良於發動西安事變之日也曾電邀宋氏本人或派遣全權代表往商「國是」。宋於此際如稍有不慎，勢必爲政府帶來無窮憂戚。然則宋於西南異動時，通電呼籲和平，西安事變後，首電中央主張討伐。宋這種擁護中央，明辨是非的態度，於促進國內的團結與統一，實具重大的影響。

其三，七七事變爆發的導因、經過以及宋哲元應付事變的始末：重點在於論述宋在事變前後態度的轉變過程，誤信和平談判與最後決心抗日守土的決定，以及中、日兩國政府間關於七七事變的交涉。七七事變的基本原因是日本軍閥不停息的對華侵逼，中國方面忍無可忍始奮起抵抗。這一點，日本人自己也不否認。重光葵即曾說過：「日本軍人對中國的态度是不妥協的，參謀官員在前線上揮舞着刀尖……軍人在華北的行動創造了一種情勢，非發動兩國間的全面戰爭，不能解決兩國間的問題。」〔註六〕惟宋哲元於二十五年十一月綏東戰爭後逐步採取了「中央化」的政策，確也是促使日本軍事當局早日發動事變的一項主因。對宋哲元來說，蘆溝橋事變是一個難得的，可以使他成爲民族英雄的機會。可是由於宋對日方的軍事計劃缺乏瞭解，對中國政府所持的強硬立場亦不甚明悉，以致誤認蘆溝橋事變爲一普通的局部事件，想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謀取局部性的解決。等到日軍開始進駐廂房，威勢北平，並對他致送最後通牒要他退出北平城時，宋才曉得「我不殺敵，敵必殺我」，〔註七〕於是下令二十九軍奮起抵抗，但

時間上已經過遲了。七月二十八日日軍發動陸空聯合攻擊，一日以內，二十九軍有五千人以上之傷亡，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同時殉難，宋哲元、秦德純遂亦不得不離平赴保。宋在事變初起時所表現的猶豫態度，自然使國人深感失望。及宋倉卒離平，中央社記者也曾向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詢問關於宋的責任問題。惟蔣委員長仍充分信任宋氏，願意代宋負責。並發表宋爲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使他有機會爲國効力。國人於目睹二十六年秋冬之季，宋以抱病之軀，率疲敝之衆，浴血奮戰於平漢、津浦前線，以致積勞成疾時，對宋亦不再有任何微辭，宋的忠愛國家是無可置疑的！

七七事變以前的兩年，宋哲元爲國家負守衛北疆的責任，七七事變以後的一年，宋是華北前線主要的一名戰地指揮官。在整個民族對日抗戰的艱鉅任務中，宋所擔任的是個前衛尖兵的角色，儘管宋在主持冀察軍政時期，若干措施不爲國人所諒解，對事變初起時的應付也難辭措置失當之咎，但以維護國家民族的長久利益之立場，來評論宋哲元的功過，吾人不難發現宋哲元功多於過。因爲宋至少對國家作過三點重要的貢獻：一、宋在七七事變前支撐華北危局，不避怨謗，爲國家保存了冀察兩省的領土與主權，也爲政府爭取了兩年備戰的時間；二、宋自十九年多以後，堅守擁護統一，服從中央，不參加任何內戰的立場，於促進國家的團結與統一，實具重大的意義；三、宋替國家訓練了一支極爲優良的軍隊——二十九軍，在抗日戰爭中創造了極爲輝煌的戰績，宋的幾位將領，如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等爲國捐軀、馮治安、劉汝明、吉星文等克盡忠勤，都是國軍將領中之楷範，爲國人所景仰效法。

著者於撰述本書期間，承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允予參考若干重要的原始資料，使能在若干重要關節上獲得最有力的佐證。復承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邀赴該校研究兩年，得以充分利用哥大東亞圖書館所藏中、日、英文資料，並得與美、日學人就若干問題上交換意見，確有助於對七七事變的全面瞭解。惟宋哲元本人所遺留之資料不多，更兼著者學識不足，自難期其成爲完璧。著者之初意本在拋磚引玉，甚盼最近之將來，國內能有討論對日抗戰這件重要歷史事件的更多的學術著作出現——時勢的演變，已不容許我們的史學家們長此保持緘默了。

附註：

〔註一〕 秦郁彥著「日中戰爭史」，（東京河出書房出版，一九六一）一書，極力開脫日方掀起戰爭的責任。James B. Crowley 完全依據日文資料及日本軍人的口述資料，撰成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一書，竟一反 Yale Maxon, Richard Storry, Thomas A. Bison 等人的論點，認為盧溝橋事變非由於日本軍方的侵略預謀所引起，中日戰爭的責任在兩國政府，與軍方無關。

〔註二〕 胡適：「敬告宋哲元先生」，原載獨立評論二〇四號，民二五、六、七，北平。

〔註三〕 劉汝明：「七七抗戰與二十九軍」，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一期，頁二七。

〔註四〕 日本現代史資料⑨「日中戰爭」②頁三一八——三六七「橋本群中將回想應答錄」。

〔註五〕 中日外交史料叢編（五）「日本製造偽組織與國聯的制裁侵略」（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印，民五五，七，臺北），頁三三八。

〔註六〕 Shigemitsu Mamoru (Trans. by Oswald White) *Japan and Her Destiny* (New York, E. P. Dutton, Co. INC, 1958), pp. 136-137.

〔註七〕 宋哲元：「告二十九軍官兵書」，載南京中央日報，民二六、八、十五。

二、宋哲元的崛起

(一) 家世與性格

宋哲元，別號明軒，清光緒十一年（西元一八八五）九月二十三日出生於山東樂陵。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病逝於四川綿陽，享壽五十六歲。〔註一〕其先世在明萬曆朝有以進士仕爲兵部郎者，故習稱哲元爲司馬公之後。〔註二〕曾祖以下，皆爲諸生，哲元亦自稱世業耕讀，家道小康。父湘及公亦以好學篤行，爲名諸生。惟湘及先生不事生產，遂致家道中衰。哲元四歲時，湘及先生離家遠遊。先因直隸名進士潘問樓之推薦，開館於山西御史閻夢九第，及潘開府南寧，湘及又隨任文案。〔註三〕哲元留故里，依母沈氏而居。母亦樂陵籍，幼嘗膏沐詩書。〔註四〕生子三人：哲元、春元、智元，皆教以忠恕。〔註五〕故哲元幼年所受教育，皆來自慈母庭訓，即哲元長成後之投身戎行，亦係秉承母氏之命。〔註六〕

哲元入伍，係在民國元年春，時已二十七歲。其入伍前所受教育，無資料可稽，惟就當時社會情況及哲元日後思想行爲之表現推斷，其曾接受傳統之經史教育，殆無疑義。初入伍時，係投効陸建章之左路備補軍，入隨營學校受基本軍事訓練。〔註七〕畢業後曾任文案，旋以哨長服役於馮玉祥部下，從此隸入西北軍系統。宋之兵學修養皆由在馮軍中研讀及由戰陣中體驗而來，學理雖能與經驗結合，惟知識領域畢竟有限，所讀不外「曾胡治兵語錄」，曾國藩「求闕齋日記類抄」及「留侯論」等古文。〔註八〕

宋以行伍出身，不十年而躍登虎將之林，〔註九〕驍勇善戰之外，乃因其謹厚之性格，誠實之態度及忠義之風範，爲層峯賞識，同僚敬重。以其謹厚，故能誠實不欺，石敬亭曾舉出下面的一段事實：

「民國九年十一月，撤至河南信陽……冬，某日，舉行夜間溝壘比賽。余奉派爲監督，防各隊作弊，有失公平競爭之精神也。傍晚，石友三率所屬四連長，乘天色未暗前，偷來預作『徑始』。石見余在山上遙望，即來邀余下山吸烟。余明知彼係施調虎離山之計，亦無可奈何。旋復上山，則見宋哲元正在山上，監視其所屬四連長，防彼等作弊。余怪而問之，哲元答稱：『練兵務實，平時謊報取巧，則戰時何以應付強敵？』石、宋二將，品格之高下，於此可見。」〔註一〇〕

其後宋先後主政陝，冀，亦屢以真誠無欺自勉並勉勵僚屬。二十四年十二月主政河北時，曾頒發四句口號令僚屬實踐力行。這四句口號是：爲國家扶正氣，爲民衆解痛苦，不爭權不奪利，說實話做實事。〔註一一〕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宋對河北全省治安會議出席人員訓話時，對於「說實話做實事」一語，曾再三叮嚀。他說：「前頒口號，要說實話做實事，必須實說實做，始能真正救國。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余則主張言行一致。真正救國，必須實說實做，真正革命，必須捨己救人。」〔註一二〕

宋之忠義精神，更爲宋之故舊及時人所一致公認。忠的方面：狹義上講，他盡職用命，不背叛長官；廣義上講，他擇善固執，不違反國家民族的利益。宋做馮玉祥的部下有十九年之久，馮玉祥的作爲他不見得完全同意，但站在部屬的職分上，當馮在河南戰場上一敗塗地時，宋沒有背叛他；當馮喪失了所有憑藉走投無路時，宋仍然照顧他。〔註一三〕宋這種志節，曾爲傅斯年所讚賞。傅曾有下面的評論：

「宋是西北軍中最忠實的將軍，從馮煥章先生經過無數艱苦，不曾棄他，這地方最足以表現其忠心與氣節。忠於主帥者，自易忠於國家，何況他的捍衛國家的勳績，雖在婦人孺子，至今稱道。」〔註一四〕

義的方面：就是講義氣，够朋友，抱赤子之心，持豪俠之氣。凡是與宋哲元有過交往的人，都不會否認宋在這